

张翎小说中的离散与女性

□金进

离开,是为了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人。

——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

归来者：离散视野中的张翎小说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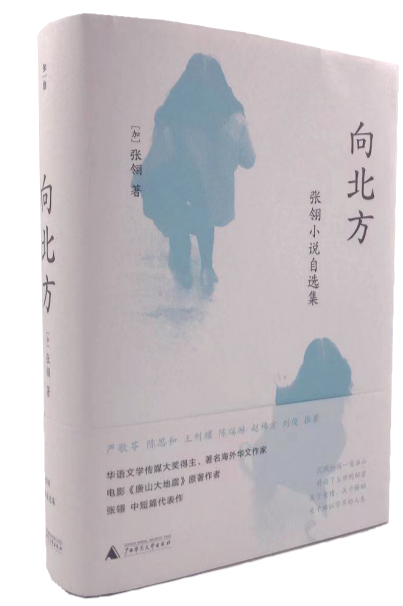
离散(Diaspora)源自希腊,Dia指的是跨越、经历;Sperien指的是播撒种子。历史上犹太人因为耶路撒冷的教堂被毁,集体流浪到埃及,后在先知摩西的带领下重回迦南地;非洲黑奴因为16世纪殖民主义扩张,被强行迁到所谓的“新世界”,等等,都是历史上的离散案例。文学意义上的离散指的是强迫或者自愿离开原居地的族裔,流放散居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方,并跟故乡保持某种联系。2016年,张翎曾经在《上海论坛》上说过:“后来我在外面写了很多关于故乡的回忆,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尽管我在国外待这么长时间,但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成年以后居住在那个城市不重要,他童年、少年、青年在哪里度过的才是至关重要的。比较奇怪的是,只有在加拿大写故土的时候,故土是清晰的,可是一回到温州马上故土的概念就模糊了。我就悟出一个道理,也许距离是必要的……同样,对我而言,距离让我有了一个审美的客观空间。我看得更清楚。”

《雁过藻溪》(2004)是一部寻根之作,在女儿灵灵考入多伦多大学之际,结婚已近20年的李越明、宋末雁离婚了,至于为什么会离婚,小说给出的答案是这是一个“没有理由的离婚……这桩婚姻像一只自行发霉的苹果,从心里往外烂……这种烂法表明了一个男人宁愿孤独冷清至死也不愿和一个女人待在一片屋檐下的决绝,这样的烂法宣布了末雁彻头彻尾的人老珠黄缺乏魅力。临走前,在大多伦多的唐人街新理的发型,让她“第一次有了要飞起来的感觉”,而同时在专卖减价名牌衣装的温娜商店,新装让她“突然变得有了几分风情”。如果说宋末雁的性别再认知在多伦多只是起点的话,在故乡与百川的情感暧昧直至发生性关系,就是她重新寻找自己的过程,从最开始,她自己“暗暗吃了惊,没想到自己如此木讷的个性,到了藻溪,换了个世界,竟也变得伶牙俐齿起来”,到与百川发生关系的“疯样子”,宋末雁对自己的女性特质有了新的认识。第二是寻找母亲不喜欢自

己的情感根源,还原母亲人生悲剧的真相。从自小被母亲厌恶,三个月被送到奶奶家,10岁回到温州父母身边,到下乡、考大学、结婚、出国。宋末雁一路在逃离自己的家,因为母亲“眼角那一丝来不及掩藏的厌恶”对她造成的伤害。如此细腻的描述父母对儿女的伤害,在《余震》中万小登身上也出现过——母亲李元妮的那次救儿还是救女生死抉择。直到母亲葬礼结束之后,暂居在母亲的远房堂兄财求伯家的时候,借着财求伯的一次失态,得知了当年财求伯强奸母亲致孕的丑事,才明白自己被母亲疏远近50年的历史真相。第三就是对自己家族人物命运和历史本相的寻根,寻找自己母系家族的历史。她发现自己的母亲曾经是藻溪大户人家的千金,去平阳上学,都是由长工老妈子接送的。自己的大外公外婆死于土改,外公外婆和两个舅舅离开大陆。而小说中,母亲与生养她,但又深深伤害过她的故乡藻溪之间的情感是复杂的,这是一种背负着历史罪恶和人性之恶的复杂情感。可以说,宋末雁的寻根之旅,让她重新认识自己、认识母亲以及认识家族,但女儿灵灵对她的不理解,又让她陷入到“母女互相疏离”的循环之中,她又陷入到一种新的困惑之中。

叙事在他方/地方：张翎离散书写的特点和价值

北美华人文学发端于19世纪中后期,当时在广东或者香港两地教会学校学习过英文的华人,或者被传教士送到美国来学习的华人开始在报章上发表英文作品,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华人移民致加州州长彼格勒阁下之公开信》(1852)。之后,北美地区诞生了第一份中文报纸《金山日闻录》(1854)。第一位华裔女作家水仙花(Edith Maud Eaton, 1865-1914)。第一篇发表于1874年旧金山中文报刊上的小说,而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北美地区华人作家所创作的华文作品开始进入发展期,其中以汤婷婷、谭恩美为代表的美国第二代移民作家,白先勇、陈若曦、於梨华等中国台湾学生为主体的留学生文学,还有以张翎为首的北美新移民作家为创作成绩最大的三大创作群体。这三大创作群体留下了不少的文学经典,如於梨华《梦回青河》《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白先勇《台北人》《纽约客》、张系国《香蕉船》、聂华苓《桑青与桃红》、谭恩美《喜福



会》、平路《玉米田之死》、李黎《最后夜车》、张翎《金山》等等优秀的华语文学作品。

张翎是北美新移民作家中的佼佼者。就创作特点而言,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精神寻根之外,对落地生根之后华人新移民所处的社会及精神状态的展现是她创作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向北方》(2006)中的主人公陈中越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已经入籍加拿大的华人新移民,同许多高知留学群体一样,他跟大学女同学范潇潇一起经历读研、留校任教、结婚生女、出国留学、移民定居的留学之路。但定居之后的生活并不理想,妻子范潇潇嫌弃他,另结新欢。陈中越找到一份听力康复师的工作去了苏屋瞭望台地区。在这里,他认识了患有先天性神经性耳聋的小学生尼尔,借着跟尼尔治病,他又认识了她的母亲——来自中国青海的藏族同胞雪儿达娃,进而了解到雪儿达娃与丈夫印第安人裘伊之间的爱恨情仇。小说叙事空间广阔,中国青海的塔尔寺、藏药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苏屋瞭望台的印第安人、草药,陈中越的移民生活和婚姻困境,雪儿达娃浪漫而传奇异国婚姻,让人感受到张翎叙事特有的空间张力。张翎的笔触一如既往的富有灵性,异域风情、原住民文化、人物通灵、传奇经历在她笔下,如蚕吐丝,循环往复而有条不紊,笔法散漫又处处有心,这些都使得张翎的艺术创作一直维持在高水平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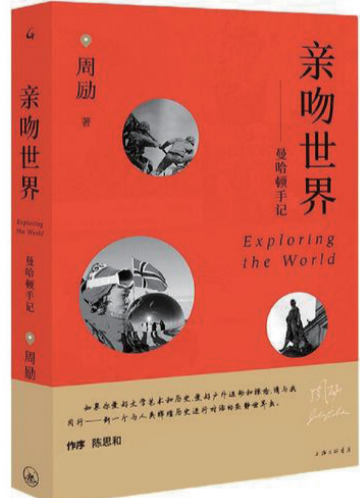
《尘世》(2002)中发生的故事开场就是冰冷而血腥的。一对相处奇怪的华人新移民夫妻,女人余小凡被大型卡车碾压成薄纸,男人刘頔明拿到了一大笔的交通事故赔偿金,用这笔钱开了一个一间咖啡馆。刘頔明认识了混血儿塔米,两人相处愉快,刘頔明重拾生活中的点点乐趣。塔米像精灵,“中看,中庸,还中听”,是刘頔明的好员工、好帮手。可是,性格传统的他还是接受了岳母方雪花安排的,认识了来自温州的在上海外企的打工妹江涓涓,成为一对跨国情侣组合。在江涓涓的带领下,他跨了“桃源”——至少张翎这样认为——就是小说中的“仙居天台,龙游丽水,平阳文成,瑞安泰顺”这些浙江真正的好地方,开始了自己的乡村之旅,也让他濡沐于民间底层生活的善良人性之中。在这里,江涓涓的家族故事开始一一展开,故事之多,就像“刘頔明摸了摸身下的石头,石身上似乎有无数纹理折皱。每一条折皱里,大约都藏了一个故事”。小说中的还乡之旅,淳朴的温州乡下的二婆的絮叨、善良的海岳岳母方雪花的遗言,让他心中对原乡的人情和人性有着莫名的感动,不论是爱屋及乌,还是寻根意识,都让他爱上了江涓涓,还很想听她那未讲的故事。返回加拿大之后的他,一直在盘算攒够江涓涓的移民申请费和将来上大学读书的学杂费。当然,小说的结局是冷酷的,塔米的热情没有赢得刘頔明的爱,一句“她是我的亲人”,彻底地将塔米的爱情憧憬击碎。但篇末的刘頔明向塔米提出约会,又让人怀疑起刘頔明将来与如“花”的江涓涓、如“树”的塔米相处的模式。原乡的情感引力和在地的实在生活之间的情感天平,在张翎的小说中,总是那么不平衡,永远在摇摆,摇摆出来的就是小说人物心中的真情实感。

文学即人学,因为文学最终是反映生活、表现人物形象的语言艺术,而百年来的北美移民文学涌现出水仙花、谭恩美、汤婷婷、白先勇、张系国、李黎、陈若曦和张翎等一批优秀的留学/移民作家,虽然他们作品的主题、艺术的形式有着代际的差异,但其中关怀人性、关注人性的文学视野是一以贯之的。像张翎《玉莲》(2001)里面命运多舛的温州乡下姑娘玉莲的保姆生涯、远嫁青海、突逢巨变的人生,着实令人唏嘘不已。《恋曲三重奏》(2002)中曾经的电视台主持人王晓楠在大陆的恋爱故事、定居北美过程中的移民故事,以及与工人董亚龙之间的情感纠葛,特别是张翎惯用的开放式的结尾,都让我们感受到她在她地方叙事的能力和魅力。

周励《亲吻世界》：

历史在手指尖跳跃和燃烧

□钱虹



《亲吻世界——曼哈顿手记》是华文女作家周励的新著,也是她“曼哈顿三部曲”中最让读者血脉贲张、心灵为之震撼的一部。作者采用纪实性报告文学的手法,从文体上来说,类似系列散文,却又是文学、史学与哲学互相交织的一部史诗;从内容上而言,既是探险实录,也是生命、激情与信念互相辉映的一部交响曲。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被遗忘的炼狱:跳岛战役探险录”为作者寻访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区遗迹进行实地考察的系列散文;第二辑“亲吻世界:镌刻在心灵岩洞上的壁画”,收录了作者在世界各国各地游览、寻访名人故居的旅行纪实;第三辑“燃情三极:南极点、北极点、珠峰逐梦”,是作者四处南极、三抵北极、分别两攀两越瑞士马特洪峰和西贡珠峰的探险实录。仅看这三辑简介,就不能不让人对作者如同火焰般生命活力与探险精神所折服。

这三辑系列散文中,“被遗忘的炼狱:跳岛战役探险录”的系列散文,无疑是全书中最值得大书特书、富有血性的一部战争忧思录。自《荷马史诗》有关特洛伊战争的描述问世以来,生命、死亡、战争、爱情就成了世界文学中永恒的四大大主题。如陈思和在《序言》中所说:“我们阅读周励的文学需要有足够精神准备,准备承受那种心灵的重大冲击,它逼迫我们重新穿越时间隧道,再去体验一场场地狱般的血与火的生死考验。”

这本书是世界华人文坛的最重要收获,她将战争、死亡、生命这三大世界文学的永恒主题纳入笔端,并以激越的文字、丰富的图片和史料、文献、档案等,将太平洋战争尤其是“跳岛”战役的全景,呈现在读者面前,凸显出战争“绞肉机”对于人类(包括交战的敌我双方)的杀戮行为的非理性、反人道及其无比惨痛的历史教训,并对此进行了全面揭露与深刻反思。

首先是尊重历史的理性精神与文学的感性书写相互融合。一位年逾六旬的华人女作家,为了冷冰冰的太平洋战争的史实变得鲜活可信,她竟采取类似“田野调查”的手法,从浮潜风光旖旎的帕劳海底“二战坟墓”,实地观察被击沉的日本军舰遗骸开始,几年中竟然跑遍贝里琉岛、塞班岛、天宁岛、关岛、菲律宾莱特

岛、吕宋岛和科雷吉多岛(战争岛)、日本冲绳岛等太平洋战争中著名的“跳岛”战役遗址和泰缅死亡铁路遗址,以及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国家博物馆、阿灵顿国家公墓、美国国家档案馆等反复查询、核对与太平洋战争相关的史料、照片、报道、录像,硬是使自己从“二战迷”成了“二战通”。这样的战地遗址考察和探险,并非仅凭一腔热情就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还需要敢于冒险的巨大勇气和一往无前的坚强意志,正如作者所言:“时而浮潜海底‘战争坟墓’,时而须雇直升机或单人小飞机飞往小岛,浓雾大风与突降暴雨都带来心理挑战,是名副其实的历险记。……怀着震惊与感动,我像考古学家一样仔细发掘历史上有或无记载的实物与事件……为的是探讨战争原貌中的人性及狼性,有时甚至是人性至狼性的转换,解开鏖战杀戮背后不为人知的隐秘。”于是,我们在周励笔下看到了她所进行的这种战争遗址的实地调查和体验,需要具备怎样的心理素质:“在帕劳海底二战遗址原生‘博物馆’潜水让我脊背发凉,担心一个不小心触碰到日本‘神风特攻队’飞行员的骸骨堆!小心战栗、胆大如虎的我穿梭在一堆堆庞大锈蚀、鱼儿出沒的战机、坦克、舰艇残骸之间,深感战争的惨烈与凄凉”。你会相信,周励就是张纯如那样的二战史专家和有着使命感的华文作家,她怀着还原真实历史与战争灾难原貌的敬畏与悲悯之心,用火热滚烫的文字,写下了一部使人类付出惨痛死亡代价的太平洋战争血肉丰满的鲜活历史。

其次,本书对“跳岛”战役史料的发掘与对历史人

物的评价相互印证。《燃烧的太平洋》写作者在帕劳贝里琉岛上发现了一块被海水包围、文字因年代久远变得模糊不清的“罗塞塔石碑”,上面刻着太平洋舰队司令、五星上将切斯特·尼米兹的题词与签名,写的是对战胜者的勇猛顽强精神的尊重与敬畏,而这块石碑竟从不为人所知:“他做了古今中外功勋卓著的将帅们都没有做的一件事,而这件事,在世界上似乎只有我这个来自纽约的中国女人注意到了——五年来我翻阅了谷歌搜索、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及美国国家档案馆,都无法找到有关这块石碑的任何记载!”发现如此活生生的珍贵史料,还有谁能说作者寻找“跳岛”战役遗址仅是凭一时的探险兴趣?作者对于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军海军统帅尼米兹、西南太平洋盟军司令、麦克阿瑟、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马歇尔、陆军上将温莱特等人的崇敬和钦佩溢于言表,然而对于他们的人生缺点甚至是污点也并不讳言,例如麦克阿瑟当年曾在日军凌厉攻势下乘坐潜艇逃离菲律宾,由温莱特将军接替他的职位。1942年5月,弹尽粮绝的温莱特将军率领驻菲律宾7.8万美非官兵向日军缴械,继而开始震惊世界的巴丹死亡行军,最后仅剩八分之一战俘活着回家。1944年10月在美军付出惨痛代价之后,麦克阿瑟精神抖擞地重回菲律宾莱特岛。在《远逝的英雄》中写到,由于麦克阿瑟在战争中的错误决策导致大批美国士兵牺牲,作着冷冷地添上一句:“现在,麦克阿瑟终于回来了。但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书中明确列出了美军伞兵在十天飞夺碧石重回科雷吉多岛(战争岛)令人触目惊心的伤亡数字,“雪耻的日子,变为战争岛之殇”。

作者写的这本书,并非只是单纯地承载历史、铭记历史,而是集史学、文学与哲学于一炉,熔铸历史、反思历史。现实映照历史,历史喻示现实。正如作者发问:“疫情之下,珍珠港是一面镜子吗?”

作为读者的我们回答:“是的。以史为镜,以史为鉴。”

《瓦猫》是葛亮最新创作的“匠人系列”小说集,收录《书匠》《飞发》和《瓦猫》三篇作品。《书匠》写新旧两派“古籍修复师”,故事横跨南京、香港两地,是为“江南篇”;《飞发》则是“岭南篇”,聚焦上海“理发”与香港“飞发”的争夺及兴衰,映照全球化时代的市井民心;《瓦猫》更是将目光远拓至西南边地,在动荡时代中钩沉瓦猫的历史,以此成就“西南篇”。熟悉葛亮的读者不难从中读出似曾相识的风格,如典雅隽永的语言,对人情世事的细描等,但真正令《瓦猫》脱颖而出的,则是“主题”的统一性和叙事的独具匠心。

对人心与世情、艺与道、记忆与技艺等关系的书写,是“匠人系列”倾注的主题。葛亮常年游走各地,他对南京、香港两地的书写和思考,在新作中以举重若轻的方式体现出来。他坦言,起笔写《书匠》,得益于救护祖父遗作《据几曾看》手稿时接触了“古籍修复师”的行业——“不遇良匠,宁存故物”便成为《书匠》的题眼。

叙事方式上,在这部作品中,葛亮对“物”有了更圆熟的书写:“古籍”(《书匠》)、Boker与“孖人牌”剃刀(《飞发》)、瓦猫(《瓦猫》)等“物”的存在不单是“知识性”的物质载体,而是呈现了“经验记忆”与“文化记忆”的辩证。

“经验记忆”指留存于个体经验中的“记忆”,而“文化记忆”则指向未来,依靠物质媒介或政治政策的引导,具有导向和目的性(集体记忆的生成也有赖于此)。但“匠人系列”并没有对“经验记忆”与“文化记忆”做生硬切割,而是呈现人置身历史漩涡中如何自处与抉择。“瓦猫”是云南汉族、彝族和白族的镇宅兽,它既有寄托哀思的纪念价值,又是叙事的牵引物。产自昆明一带的瓦猫,却现身迪庆藏族自治州,且与纪念山难逝者的石碑镶嵌一起,本身就显得怪异。《瓦猫》正由此切入,借叙述人“我”(毛果教授)为仁钦奶奶送信、寻瓦猫制作者为线索,串联起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记忆。葛亮将虚构人物嵌入历史,赋予他们以血肉之躯,也借着对动荡时代(抗战和“文革”)的勾勒,将瓦猫塑造为经验记忆与集体/文化记忆互相角力的“场域”。在看似稳固的叙事中,《瓦猫》流淌着某种岌岌可危的气息:旧城改造(推掉旧宅、兴建地铁)始终笼罩着小说,而镶嵌在旧宅屋顶的瓦猫,则因久远的仪式、神秘的民俗性而沦落为岁月淘洗后的残存物。《瓦猫》是为濒临消失的时代“复魅”。

二

“拜师学艺”是另一叙事亮点。《瓦猫》中宁怀远的“拜师”既有“民俗学”的意味,亦和“家人父子”的伦理密切相关,这点在宁怀远、荣瑞红和祖父荣老爷子三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荣老爷子授予荣瑞红造瓦猫的手艺,又试图以家长制的权威反对荣瑞红和宁怀远相恋。书生(宁怀远)学制瓦猫,与荣瑞红因爷孙反对她和怀远的恋爱而赌气关在作坊摸黑“盲制”瓦猫,是小说中关于匠人如何学成的对照书写。这也说明,手艺需要时间和精力才能练成,手艺人独特的感知和审美造就了“一猫一态”,远非机械生产可以比拟。

在《书匠》(其中专辟了“徒弟”一节)和《飞发》中,“拜师学艺”也有所敷陈,彰显的是全球化时代的新旧/东西冲突(《书匠》中以老董和师承西洋古籍修复术的简女士为对比,《飞发》则是上海理发和广东飞发的对立)等大叙事之间的拮抗。

譬如《飞发》对“家人父子”(师徒关系)的处理就极富戏剧性:翟玉成的“乐群”理发室是典型的广东“飞发”,无论手法抑或都散发着粤地的“街坊精神”。但庄师傅(上海理发公司“温莎”老板)却对“飞发”不屑一顾。小说中,翟康然自幼崇尚西式风尚,他和父亲翟玉成对理发有着截然不同的体认,他的发廊继承的是上海理发的手法,而父亲却守旧得很,几十年如一日剪的都是“陆军装”和“红毛装”。当得知儿子拜入庄师傅门下时,翟玉成和翟康然要断绝父子关系。可以说,“理发”与“飞发”之争不仅事关商业利益,也事关“匠人”的尊严,更寄托了作者对上海、香港文化精神的不同理解。

三

“匠人系列”的叙述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横跨东西两地,如果说“岭南篇”“江南篇”“西南篇”不过是抽象的地理划分,那么真正浸润其中的,是由不同地方经验叠加、糅合而成的“小说地方志”。“国有史,地有志”,方志或地方志乃记录地方自然、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的书籍文献,但这里的“小说地方志”有别于借鉴志书框架及编纂理念而写成的“方志小说”。“匠人系列”不拘泥于一时一地,而是将不同的区域文化、人文地理加以串联和勾勒,展现出一幅小说地方志的全景图像。

在《书匠》中,守旧的修书匠老董看不惯时兴的新技术,“文革”时他受革委会逼迫写检举材料,使得“我”的祖父被革职,自己也因此离开修书业,以摆摊修鞋为生。“文革”后,老董答应图书局的请求回来修书,是带着赎罪之意的,对他而言,修书更像是修复历史中失落的世道人心。借此,《书匠》不仅揭开了心灵的伤痛史,更引出南京世俗生活的一面:老董用西瓜瓤法除书页磨痕,带女儿元子和毛果到南京郊外“看秋”,捡碗碗做修书染料等情节,不啻于某种方志,并且是文学化了、日常化了的方志书写;《瓦猫》中对迪庆藏族自治州与昆明等地的民俗、饮食、语言的描绘,以及《飞发》对上海理发的行业规矩、粤地“飞发”行话、“香港精神”的刻画(小说中支撑翟玉成和妻子郑好彩生存下去的,便是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港人精神),也是活生生的“小说地方志”。可以说,借着对父辈“发家史”和“兴衰史”的书写,葛亮将笔触延伸进香港的当代社会史,由此打通内地与香港的历史联动。

“匠人系列”的取径之处,就在于不生搬硬套地方性知识和历史掌故,而是将笔力紧紧倾注在“人”身上:看似冷峻,实则饱含修书热情的简女士,执著而隐忍的老董(《书匠》);讲排场、刻薄的庄师傅和执拗、不服输的翟玉成(《飞发》);质朴又有担当的荣瑞红,书生气又不失士人风骨的宁怀远(《瓦猫》)。葛亮写人,擅长用“对照”手法,上述所举的形象不仅是“圆形人物”,而且是“对位式”的,在这些人物身上,小说家寄托了其对不同时代、世道人心的体恤和追索。



清供 李退之 摄
HUA XIN